

走出「超空间」

詹姆斯·詹姆逊
电影批评研究

张文
著

Leaving Hyperspace,
on Fredric Jameson's
Film Criticism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走出『超空间』

詹姆逊

电影批评研究

张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超空间”：詹姆逊电影批评研究 / 张文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3
ISBN 978-7-308-21192-5

I. ①走… II. ①张… III. ①詹姆逊 (Jameson, Fredric 1934-)
— 电影评论—研究 IV. ①J905.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50066号

走出“超空间”——詹姆逊电影批评研究

张 文 著

策划编辑 吴伟伟
责任编辑 陈 翩
责任校对 丁沛岚 袁朝阳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5千
版 印 次 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1192-5
定 价 5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认识一个更加丰富的詹姆逊

——写在《走出“超空间”——詹姆逊电影批评研究》付梓之时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大潮兴起，最早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美国当代学者之一。通过詹姆逊的一系列著作，我们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外部世界，了解到当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时，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

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西方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社会，知识作为生产力，体现为权力象征，谁掌握了知识谁就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转变为人与人的矛盾。这时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各种文化思潮风起云涌。随着文化广泛地渗透进商品的各个领域，消费文化出现。这样就使精神产品从高尚的地位下降为普通商品的地位，精神生产成为商品生产。为了适应商品的供求关系，这些文化产品就要不断地变换形式以满足大众消费的需要，以消解中心、无确定性、无深度感、平面化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应运而生。

后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还是一种价值系统，是一种文化精神。它不仅体现在与传统相对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且体现在精神的嬗变。就反权威、多元论、非中心和冲破旧体制来说，其与现代精神具有相同的特征，因



为现代主义就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当宣告古典主义终结之时，现代主义开始形成了新的权威、新的范式。如果失去了革命的精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新生代的现代主义者举起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大旗向老一代的现代主义者发起了总攻，这不仅是现代主义的必然归宿，也是人类思想进程的必然归宿。

作为一位有着马克思主义学养的西方当代学者，詹姆逊的理论既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消除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主体的消亡与零散化的特征等社会嬗变，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中。学界通常将詹姆逊的学术研究分为前期文学研究和后期文化研究，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三部曲”为代表作，后者以《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代表作。国内学术界也是大致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下了解、研究詹姆逊，其实这是很有缺憾的。

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詹姆逊做了大量跟踪研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内学者十分熟悉的研究对象，也还存在着一些研究上的盲点。这是因为詹姆逊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所涉猎的问题，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还涉及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如詹姆逊曾撰写过数量可观的电影批评，但国内学术界对这些电影评论的译介非常有限，有些作品至今没有中译本，这种现象与詹姆逊在西方学术界的知晓度及研究的全面程度很不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文的这本新著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正如张文所说：“在詹姆逊的批评实践中，电影批评可谓重中之重。如果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贯穿在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文学作品的解读中，那么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则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具体电影作品的解读中”，“电影批评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詹姆逊的后现代思想”。



张文的著作将詹姆逊置于“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宽广的理论视域下展开讨论，书中翔实分析了詹姆逊电影批评的理论视野、研究方法和思想路径，同时论述了詹姆逊电影批评的重要学术价值、社会意义和局限。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呈现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素的来源和内容；第二部分阐述詹姆逊如何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将电影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社会因素进行有机结合来实现电影的“认知图绘”功能；第三部分评估詹姆逊电影批评的得与失。

我们知道，“认知图绘”是詹姆逊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指创设某些方法，使人们可借助现存之物、现实之事来了解其他的不能再现或想象的事物。这个术语的灵感来自地理学家凯文·林奇的《城市的印象》。詹姆逊借用这个术语是为了表示个人与社会的交叉，从而使人们在他们活动的城市空间里发生作用，并将心理与社会、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詹姆逊实际上把阿尔都塞的“真实客体”同拉康的“真实”等同起来了，所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拉康的“真实”就是历史。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解决了真实界同想象界这两个维度的问题。那么还剩下一个维度——“象征界”，“认知图绘”的目的就是实现象征的功能。拉康的理论建立了三个“界”或者说三个维度：想象、真实与象征。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重新界定为一种再现，它表达了主体及其真实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关系。阿尔都塞认为，科学话语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的：科学以批判在其之前的意识形态理论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来证明它自己的科学事实；而理论生产既不是关于真实客体的表述，也不是直接关于真实客体的研究。也就是说，真实界与想象界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到历史与现实中对于意识形态和科学话语的分析里。由此，詹姆逊建构了一种适合晚期资本主义境遇的“认知图绘”美学。

将许多异质的理论融会贯通，逐步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詹姆逊理论的一大特色。詹姆逊的寓言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本雅明的学说。寓言的主



要特征是“言此意彼”，文本的书写与它实际要表达的内容不一致，也就是所指与能指分离。寓言是一种再现现实的模式，也是现实主义的常见手法。之后寓言遭到了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批判。表面上寓言体现了差异与断裂，实际上潜在的是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统一起来形成了富有多义性的象征主体。后现代主义在文艺与美学理论中都有着隐在的寓言倾向，詹姆逊认为现在的寓言形式超过了以往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过了现实主义本身。詹姆逊对寓言的呼唤本质上是在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对总体性乌托邦的渴望。鉴于后现代主义本身或许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他把希望寄托在电影文本中。

詹姆逊的学术思想庞杂而丰富，语言本身又十分晦涩，要准确理解并非易事。值得称道的是，张文很好地理解、领悟和运用了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和寓言理论，并运用理论仔细分析了詹姆逊的电影批评实践。詹姆逊在《可见的签名》中探讨的对象几乎都是好莱坞电影。在这些商业电影中，詹姆逊不仅看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还看到了隐匿于影片中的政治内容。而《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关注的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是远东地区的电影，这些电影对西方观众而言相对陌生。詹姆逊对世界各地电影的选择，体现出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地缘政治状况的关切，他的兴趣在于电影对晚期资本主义超国家本质力量的描绘。如果说《可见的签名》是詹姆逊对电影中“政治寓言”进行“认知图绘”的结果，那么《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则是对其中“地缘政治寓言”进行“认知图绘”的结果。前者注重的是电影对主体经验的寓言化，后者强调的是电影对地缘政治身份的寓言化。詹姆逊寄希望于电影中的政治寓言和地缘政治寓言，来帮助主体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新的世界体系中重新获得一种集体性经验，或者帮助主体绘制出一张晚期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地图，实现电影的“认知图绘”功能。



为了撰写有说服力的电影批评，詹姆逊曾观看了4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非常可贵的是，张文发挥她的英语语言优势，“按图索骥”，尽可能查找、观看了詹姆逊书中所涉猎电影的影像资料，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即便是部分有中文译本的文献，她也尽可能地查找核实了西文原文。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她最终得到丰厚的收获。经过深入研究，张文发现：在《可见的签名》中，詹姆逊将电影文本建构为一种“签名”。签名并不总是清晰可辨的，因此詹姆逊的使命就是理解这些难以阅读但仍然无处不在的签名。她最终得出了重要的研究结论：詹姆逊始终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解读电影文本，利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将文本之外的内容，例如历史的原材料、经济、政治态度、意识形态等拉回到阅读电影文本的过程中，使电影文本本身恢复“充分的言语”；同时，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语境中，希望通过对电影文本的“认知图绘”工作来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因为在他看来，当前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更具有文化上的特征。这个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大量文献证明了詹姆逊是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开展电影批评的，他希冀再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并恢复主体对其的认知。与诸多高举反总体性、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家不同，詹姆逊致力于发展一种具有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这正是詹姆逊不同于同时代理论家的地方：他认为应该从审美、从形式出发，最后在终点与政治相遇，在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特点表露无遗。詹姆逊对于后现代主义缺乏政治性这一点非常不满，但仍怀有美好的乌托邦情结，盼望随着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的完全统一，后现代主义在将来的发展中能体现出政治性并进而干预政治。

作为一位严谨的青年学者，张文在肯定詹姆逊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其局限性，即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例如，一方面，詹姆逊坚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否定清晰的工人阶级意



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坦言自己还未能想象出新型国际无产阶级的面貌，最终只能将后现代文化政治学局限在电影中，并将使命寄托在消费大众身上，这说明詹姆逊身上具有“新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可见，张文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批判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是一位青年学者应当具备的学术底线。

至此，张文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她的新著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更为多面、更为立体、更为丰富的詹姆逊：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个具有独特乌托邦守望情怀的探寻者，一个具有敏锐艺术天赋的批评者。

詹姆逊是一位健在的学者，他的思想还在发展，学者们研究的脚步不该停歇。像詹姆逊一样关注时代、关注与时代紧密结合的问题，是学者的天职。万事开头难，张文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期待着她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是为序。

马 驰

庚子元宵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詹姆逊电影批评的理论视域——“新马克思主义” / 9

第一节 詹姆逊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继承 / 12

一、“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回溯 / 13

二、詹姆逊对德法两种学术传统的包容与吸收 / 20

第二节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素 / 30

一、作为完整共时结构的生产方式 / 30

二、“永远历史化”的策略 / 33

三、更具语义优先权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 35

四、不可或缺的“总体性” / 39

第二章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电影批评 / 43

第一节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典型的电影 / 46

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 46

二、集中体现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电影 / 60

第二节 作为后现代文化政治学实践场的电影 / 65

一、何谓后现代“超空间” / 65

二、如何走出“超空间”——“认知图绘”美学实践 / 71

三、“认知图绘”何以可能——电影寓言结构解码 / 77

第三节 詹姆逊对“认知图绘”美学的实践

——以具体电影文本为例 / 84

一、对“政治无意识”的“认知图绘”——以《闪灵》

《热天午后》《歌剧红伶》为例 / 85

二、对“地缘政治无意识”的“认知图绘”——以《甜蜜的梦魇》

《日蚀的日子》《恐怖分子》为例 / 105

第三章 詹姆逊电影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 133

第一节 詹姆逊电影批评的贡献 / 136

一、复兴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 136

二、在某种程度上对“新马克思主义”纠偏 / 152

三、摸索具有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 / 154

四、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 157

第二节 詹姆逊电影批评的局限 / 166

一、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 / 166

二、后现代文化政治学实现存疑 / 169

三、文风过于晦涩和滞重 / 174

结 语 / 178

参考文献 / 184

后 记 / 193

绪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¹是当代杰出的文学与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在文化上迎来了现代主义文论，诸如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思潮纷纷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在还未厘清现代主义文论的情况下，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也几乎同步悄然进入中国。后者虽然在西方已历经20余年的发展，但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仍然十分新鲜陌生。1980年12月，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一文，首次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引入中国。此后国内学界出现了零星译介后现代主义创作和概念的文章，但此时作为批评话语的后现代主义尚未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登陆中国，他在北大的演讲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6）成为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著作。詹姆逊的到来加深了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诸如福柯、哈桑、拉康、格雷马斯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也随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全新视野，大大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极大推动了国人研究后现代的热情，由此后现代研究热潮在90年代盛行一时。当时，国内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述译介以及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话题争鸣。可见，詹姆逊是中国学界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之间当之无愧的重要“桥梁”。

1 在中国，Fredric Jameson 通常被译为詹姆逊、詹明信、杰姆逊、詹姆森等，本书一律采用詹姆逊这一译名，但在引用相关表述时仍然保留原作者的译法。

虽然詹姆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介入后现代问题，但他的作品隐含了一种开放的“总体性”，即一种相对统一和连贯的理论框架。学界通常将詹姆逊的学术研究分为前期文学研究和后期文化研究，前者以“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 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Marxism and Form : Twentieth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1）、《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1972）、《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1）为代表作，后者以《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为代表作。事实上，詹姆逊的后现代研究没有独立于前期研究，而是前期理论研究的延续。例如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 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的“前言”中，詹姆逊就已经注意到了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新方式所导致的阶级结构的隐匿和主体的碎片化问题。詹姆逊在早期著作中提及的片段或观点预示了他后来的理论旨趣，例如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反复提及晚期资本主义主体消解的问题。因此，詹姆逊的研究不能被机械地划分为两个时期。

詹姆逊著述丰富，观点新颖，在国内外学界具有极大影响力。国外学界对詹姆逊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多数研究集中于詹姆逊的文学理论，例如威廉·道林（William Dowling）的《詹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1984）、克里斯托弗·怀斯（Christopher Wise）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1995）、克林特·伯恩海姆（Clint Burnham）的《詹姆逊的无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美学》（1995）等等。也有学者对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做出评介，诸如丽萨·威尔森（Lisa Wilson）的《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2000）、卡伦·亚尔（Caren Irr）与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主编的《论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到全球化》（2006）等等。就国内学界而言，中国学者对詹姆逊的学术思想也怀有极大的研究兴趣和热情。截至目前，除

了《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1992）、《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2013）以及詹姆逊新近出版的《古代和后现代：关于形式的历史性》（*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 On the Historicity of Forms*, 2015）和《一个美国乌托邦：双重权力和世界军队》（*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2016）尚无完整的中译本外，其他著作皆有中文译本。20世纪末，国内研究詹姆逊学术思想的著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詹姆逊的文化阐释理论，尤其青睐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这实际上是对詹姆逊学术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回应。在诸多国内学者中，要数李世涛对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研究最为全面。在他看来，国内汉语学界对詹姆逊的研究亟待深入，也尚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就大陆汉语学界来说，目前对詹姆逊文化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存在着肤浅和时尚化的局限，满足于个别观点的引述，缺乏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更缺乏批判性的反思。”¹ 基于此，他撰写了《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一书，内容涉及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时空理论、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现代性理论、乌托邦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思想等等。李世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学界对詹姆逊研究的纵深发展。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詹姆逊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丰富资源。然而，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界的詹姆逊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发展空间——詹姆逊的电影批评几乎无人问津，这种现象与詹姆逊在学界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诚然，詹姆逊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非常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至今都仍在被学界反复研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詹姆逊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批评家。他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涉及众多艺术门类，绘画、音乐、建筑和电影等都是他的批评对象。正

1 李世涛：《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

是在具体的艺术文本分析中，他的理论得以显现，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评价的：“詹姆逊的论著却另辟蹊径，堂而皇之地把后现代主义放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以及相关的主要话语领域之内加以考察。这样一来，与这个时代其他一切文献记载相比，他对这个时代的描绘最为全面和丰富多彩。”¹ 因此，我们在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思想时，不应当只重视他的理论研究而忽视他的批评实践，否则我们无法深刻地、全面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

在詹姆逊的批评实践中，电影批评可谓重中之重。如果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贯穿在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文学作品的解读中，那么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则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具体电影作品的解读中。为了撰写相关论文，詹姆逊曾观看了4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电影批评论文被集结成两部论文集《可见的签名》（*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1990）和《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以下简称《地缘政治美学》）出版。在《可见的签名》中，詹姆逊将电影文本建构为一种“签名”。签名并不总是清晰可辨的，因此詹姆逊的使命就是理解这些难以阅读但仍然无处不在的签名。这部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多写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批评对象多来自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只有《论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以来自委内瑞拉、波兰和哥伦比亚的三部电影为批评对象。与关注西方电影的《可见的签名》不同，《地缘政治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一些西方观众不太熟悉甚至陌生的电影作品，特别是来自远东地区的电影。这部论文集根据詹姆逊在英国电影学院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所有文章都是在詹姆逊的重要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表之后完成的，因此这部论文集可以被视为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延续。

詹姆逊对电影这一当代大众文化样式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究其原因，电影是后现代社会中现实转化为形象的最典型代表，同时电影本身的

1 佩里·安德森. 后现代性的起源 [M]. 紫辰, 合章,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0.

“认知图绘”¹ 功能为詹姆逊实践他的后现代文化政治学提供了可能性，电影的这两种特质将在本书中得以详细阐述。概言之，电影批评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詹姆逊的后现代思想。尽管我们知道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国内学界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思想早已有不少研究，但大部分学者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命题，以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构成元素的描述和归纳，而这些观点常常被固化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正如胡亚敏指出的：“问题是由于詹姆逊的这些论述经常被引用，几乎成为人们对后现代状况和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一种思维定式，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² 本书拒绝陷入思维定式，通过关注詹姆逊后现代思想中被长期忽视的电影批评来补充当下的詹姆逊研究，以期更为全面地呈现和分析詹姆逊的后现代思想体系。

就国内学界而言，关注詹姆逊电影批评的学者屈指可数。胡亚敏是最早关注詹姆逊电影研究的学者。她曾在博士学位论文《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2001）的第三章中以“语言的挽歌——詹姆逊的影视艺术研究”为小标题，论述了詹姆逊对后现代影视的分析，其中包括电影的视像效果以及“怀旧影片”的伪历史性等，论证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所具有的消费娱乐性质，但未充分阐述詹姆逊的电影观及其对电影文本的辩证分析。此后，陈学明和马拥军在《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³（2002）一书中论述了詹姆逊对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分析，肯定了詹姆逊强调艺术作品与政治互相关联的立场。除了上述博士学位论文和著

1 “cognitive mapping”在国内学界通常被译为“认知图绘”或“认知测绘”。本书作者一律采用“认知图绘”的译法，相关引文中不再保留原作者的“认知测绘”这一表达，以“认知图绘”取而代之，因为“认知测绘”一词更偏向于地理性勘测，而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是难以精确再现的。

2 胡亚敏. 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再探 [J]. 国外文学, 2002(4): 10-17.

3 陈学明和马拥军在《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一书中论及詹姆逊的影视批评。在该书的第二章“詹姆逊：‘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出于兴趣’”中，陈学明和马拥军论述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这一部分对《可见的签名》中论述的大众文化以及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两个问题展开分析，肯定了詹姆逊强调艺术作品与政治互相关联的立场。参见：陈学明，马拥军. 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35-276.

作，也有零星几篇论文论及詹姆逊的电影研究。2004年，曾耀农发表了《詹姆逊电影理论及在中国的传播》一文。该文概括性地介绍了詹姆逊的影视观，包括后现代电影的生存环境和“大杂烩”本质、怀旧电影的复古性、“认知图绘”与后现代电影的关系等等，并简述了詹姆逊电影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篇文章虽然以詹姆逊的电影理论为研究对象，但通篇未论及他的两部电影批评论文集，因此相关分析和论证缺乏说服力。2011年，孙柏发表了《集体性及其缺席的形式——解析詹姆逊〈可见的签名〉中的论题与方法》一文。这篇文章首次将詹姆逊的理论和电影文本结合起来，论证了詹姆逊在《可见的签名》中反复探讨的核心议题——电影对当代消费大众集体性的重塑，向我们展现了詹姆逊提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闫楨楨的《文本/文化阐释的“总体性”视野——读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可见的签名〉》（2014）一文，通过解析两组辩证的关键词——形式/历史、意识形态/乌托邦，探讨詹姆逊如何将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视野与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实践结合在一起，肯定了詹姆逊的文化阐释在当前语境中的意义。还有张文的论文《论詹姆逊的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甜蜜的梦魇〉》（2016）、《论大众电影中的政治寓言——以詹姆逊评〈热天午后〉为例》（2019）、《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电影批评中的寓言思想》（2020）、《詹姆逊电影批评的贡献与局限》（2020）与吴娱玉的论文《为詹姆逊重绘台北地图》（2017）对詹姆逊两部电影批评论文集集中的相关篇章加以评述。除此以外，国内学界再无与詹姆逊电影批评相关的论文。

国外学界同样存在不够重视詹姆逊电影批评的问题。国外学者对《可见的签名》的书评多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该书出版的头几年。最早对《可见的签名》做出评论的是凯瑟琳·罗（Kathleen Rowe），她在1991年第4期的《影视评论季刊》上发表了《詹姆逊电影批评中的阶级与寓言》一文。此外，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托马斯·胡恩（Thomas Huhn）、希